

评“救国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

郭绪印 盛慕真

“救国会”全称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日战争期间，它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新中国成立后，该会以救国的历史任务已完成而宣布结束。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全国各大城市先后建立各界救国会。一九三六年五月底，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各地救国会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救会”。它是一个以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救亡团体，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左翼政治派别。其主要领导人有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抗日救国的活动和主张，在当时的爱国团体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中，具有典型意义，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坚持抗日反对妥协是救国会的思想基础

救国会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华侵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出现的群众团体。爱国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是救国会的主体。救国会有中国共产党员（未公开党员身份者）、国民党员、国家社会党员，以及第三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成员。他们是社会上最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一部分人。他们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虽有很大差别，但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都感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①因此在“共赴国难”的旗帜下，以救国会的组织形式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维系他们的思想基础就是要求抗日，反对对日妥协^②。救国会章程提出的宗旨是“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③，这是救国会中不同党派的人士的共同呼声。在民族存亡危急之秋，救国会的这一立场符合人民的意愿，顺应历史的潮流，也是救国会能够对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产生巨大影响的基本原因。

救国会既以坚持抗日，反对妥协为思想基础，就必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们认识到，正是由于这一政策，中国在“九一八”

① 《救亡情报》第1期，1936年5月6日。

② 参见“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全国的宣言”，《大众生活》第1卷第9期。

③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救国会言论集》1937年5月印行。

事变后的五年内，“不战而丧失一百六十万方里之土地，五千余万之人民。”^①救国会人士也懂得，蒋介石政府坚持对日妥协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集中精力进行“剿共”内战。一九三二年初“淞沪停战”之后，蒋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那时起，爱国民主人士曾不断批评这一政策的“误国祸国”性质，华北事变后，章乃器发表了著名的《四年间的清算》一文，他痛切地揭露四年来在“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方针下，“杀戮了多少的勇敢有为的英俊青年！毁灭了多少田园庐舍！消耗了多少的枪械弹药！”^②而敌人正是以“反共”为烟幕，从东北向华北步步进逼。“‘反共’的口号，目下已经成为敌人和汉奸殷汝耕辈的骗人工具”。“我们不能不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用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气！……赶快掉转头来，救救青年，救救中国！”^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和“安内”方针是救国会要求实行全国抗战的宗旨的具体表现，也表达了一切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

值得指出的，救国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民族感情的冲动，而是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亡华之心”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犀利地指出：“四年余的事实告诉我们：敌人对中国的侵略，决不是少数人的盲动和野心，而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积重难返的经济恐慌和财政赤字造成了他积极侵略的大陆政策”^④，“日人大陆政策的主要作用在灭亡全中国”^⑤。救国会能够从帝国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和战争本质的高度来认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这些认识是相当深刻的。正因为如此，在国际上存在着“绥靖”政策，在国内仍流传着和平幻想的情况下，救国会能够清醒地指出：“不抗战，就只有灭亡”；“不投降，就只有战争”^⑥，“保持和平是梦想，永远不能实现，亦等于坐以待毙”^⑦。基于上述认识，救国会坚决反对南京当局对日妥协的论调。南京政府中，有人畏敌如虎，认为日本武器优良，万一爆发战争，可以“三天灭亡中国”；有人想以外交的途径达成妥协；而亲日派则公然主张对日“亲善”。对这些误国卖国论调，救国会给予猛烈的驳斥，他们尖锐地指出：“想用妥协、提携，亲善，甚至游说的方式，希求敌人的觉悟，那真是与虎谋皮。”^⑧在日本的大肆进攻面前仍鼓吹“合作、亲善，敦睦邦交”，就是“教导人民亲敌，堕落民族气节”的“汉奸口号”。“三天亡国论”、“唯武器论”则是“为汉奸们的不抵抗主义、投降主义辩护”的“汉奸理论”^⑨。这些一针见血的揭露和批判，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内，确实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当时中国面临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选择：一是继续内战，让日本侵略者在“共同防共”的烟幕下鲸吞中国；二是停止内战，掉转枪口坚决抗日。前者是南京政府决策人物的“亡国的政策”；后者是一切爱国的炎黄子孙选择的救国之路。这两条道路、两种命运进行了生死的搏斗，结果是后者战胜前者。内战为抗战所取代。这一历史结局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救国会坚持抗战要求，反对对日妥协的政治立场以及为此而进行的积极斗争，是促成全国抗战到来的积极因素之一。

“八·一三”事变之后，全国抗战实现了，但是，中国仍然存在着坚持抗战，反对妥协的问题。事实证明，在国民党当权阶层中，除汪精卫集团分子外，企图谋求妥协，中止抗战

① 《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②③ 章乃器：《四年间的清算》，《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

④⑧ 《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935年12月21日。

⑤ 《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⑥ 《救亡情报》第21期，1936年10月11日。

⑦ 《大美晚报》1936年1月28日。

⑨ 《救亡情报》第1期，1936年5月6日。

的,确实还大有人在。克服投降危机始终是抗日军民的任务。救国会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坚持统一战线内部的思想斗争,批驳和制止一切妥协言行。他们认识到:“取消思想斗争,是使一切汉奸妥协思想有露脸的机会”^①。胡愈之在“八·一三”上海抗战期间就指出:“妥协的病菌只是潜着,没有呈现在表面,但是一到了抗战偶然遭了一次挫败,这病菌就会活跃起来”。“我们自然毫不畏惧挫败,我们所畏惧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自身中间妥协投降的病菌随着军事的挫败而活跃”^②。抗战期间救国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病菌”的斗争较集中地反映在汪伪叛逃和皖南事变期间。

汪伪叛变后,救国会并不满足于谴责和声讨。他们发表《快邮代电》,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以此事变为殷鉴,提高对汉奸国贼之警觉,自兹之后,凡属言论行动表现妥协动摇倾向之份子,均应随时揭发,严加制裁。”^③皖南事变引起了国内政治的严重危机,“和平传说,妥协空气”又一度喧嚣起来,救国会立即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提出了《对于改革政治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其中第一条即为:“坚持抗战国策,求其更须彻底”,对“迄今抗战阵营中尚潜伏若干妥协主和分子”加以揭露,重申“彻底坚持抗战”的立场^④。救国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进行的反对投降危机,坚持抗战到底的斗争,对于克服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危险,将伟大的抗战进行到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救国会的主要任务和一贯主张

停止一切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现抗战的前提条件,因此,救国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就明确规定了自己“当前最迫切的主要任务”仍是打破“自相残杀”的危险僵局,“促成各党各派一致抗敌的联合阵线”^⑤。

“九一八”事变乃至华北事变后,中国始终存在着两种性质的内战:一种是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为争夺地盘和实力而进行的混战;另一种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工农红军的战争。这二种战争就是蒋介石“安内”政策的主要内容。如前所述,救国会既以促成抗战为己任,就必然猛烈地抨击国民党当局的这种误国政策。但是,救国会并非号召“反蒋抗日”,而是坚决主张“在这敌寇日深而内战纠纷依然严重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广大的团结,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而“决不忍见国内任何的势力,再在相互冲突中遭受一丝一毫的损失”^⑥。救国会明确宣布:“我们并不是推翻政府”,民众“应该竭力督促政府出兵抗日,而且尽可能与政府合作从事抗日”。“只有在政府不顾民众,一味亲敌,甚至承认亡国条约的时候,民众方可以起来一致反对政府。”^⑦这种以抗日为前提的,有原则的承认南京政府的合法性,并积极推动南京当局走向抗日的立场,是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的。因为日本在华北的扩张直接损害了南京当局和英美在华势力的利益,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有转向抗日的可能。中国共产党鉴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也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的《回师通电》中改变了“反蒋抗日”的提法,主张“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⑧。救国会在此前后对南京政府的基本

① 《国民公论》第1卷第1号,1938年9月11日。

② 《抗战》三月刊第15号,1937年10月6日。

③ 《全民抗战》5月刊第46号,1939年1月5日。

④ 《大众生活》(香港版)第四期,1941年8月8日。

⑤ 《全救会成立宣言》。

⑥ 《救亡情报》第6期,1938年6月14日。

⑦ 《生活知识》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38年8月5日。

⑧ 《六大以来》第762页。

态度是：一方面反对其“对敌人作无止境的让步，而想用武力征服敌党敌派”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声明，救国会和政府的争论是“政策之争，而不是政权之争”，只要政府“能够赶紧切实领导起来一个抗日战争，它在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是不必顾虑的”^①。这一基本态度显然是同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制定的“逼蒋抗日”的方针相一致的。

为了促成包括南京政府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中提出建议：“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各党各派立即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介绍，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该宣言还强调指出：“救国会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的任务，有历史的重要性。”^②呼吁：“除了汉奸以外，我们在横的方面，坚决主张各党各派的合作。在纵的方面，诚意要求社会各阶层分子的合作”，“大家捐弃前嫌，不咎既往”^③。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救国会这种竭力促进民族团结的政治主张和实际努力是十分正确的，它说明中国进步的知识阶层不仅怀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心，同时也能够较深入的洞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符合民族利益的大政方针。他们的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基本一致。

救国会关于团结御侮，一致对外的立场并非一种一般的抽象原则，徒具空洞的宣传形式。相反，他们通过实际的政治行动，以他们对于历次重大事件的正确态度来实践和发扬这一原则。他们促进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立场主要表现在对待“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具体态度上。

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地方实力派和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矛盾加剧，同时也由于全国抗日潮流的推动，两广当局成立“抗日救国军”，出兵湘南，南京方面也立即调兵遣将。当两广地方势力内部分化，很快失势之后，蒋介石仍准备以武力最后解决桂系势力，内战危机迫在眉睫。救国会对这场“两广事变”的态度非常明确：第一，同情两广当局提出的抗日要求和主张，但他们也看到了西南军阀的“抗日运动”是“不够真诚的”，而把希望寄托在西南人民身上。救国会主要领导者章乃器指出：这一抗日运动“即使发动的时候不够真诚，只要群众和士兵的力量能够使一个假抗日变成真抗日”，就应当“抓住抗日两个字要求兑现”，而不应轻易否定。救国会呼吁两广当局首先给其统治下的人民以抗日言论和行动的自由^④。第二，救国会一方面批评两广当局有“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倾向，要求“西南当局应该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取对立态度”，还拒绝了兩广当局许给的官职，也不派代表前往广西；另一方面，救国会也竭力反对南京政府以武力解决两广问题，要求“立即停止对西南的军事行动”^⑤。这些主张都凝聚着“团结抗日”的原则，表现出救国会反对任何形式的内战，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责任感。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方面的讨伐派兴师动众，内战危机再度出现。救国会主要领导人已被关押，并被南京方面的某些人诬为张、杨的同谋而企图加害^⑥。在这种历史的紧急关头，救国会依然坚定地恪守反对任何内战，主张团结抗日的原则，先后发表了二次宣言，

①② 《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③ 《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

④ 《救亡情报》第12期，1936年7月26日。

⑤ 同上，《生活知识》第二卷第6期，1939年8月5日。

⑥ 参见胡子婴：《关于救国会和“七君子”事件的一些回忆》，第459页。

其基本态度可归纳为二点：一是反对“讨伐派”调兵遣将打内战，要求“大家尊重全国民众的意旨，进行和平的磋商”；二是对西北军民的抗日要求及其行动寄予极大的同情，确认“西安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和政府不能坚决厉行抗敌救亡政策的直接结果”，强烈要求“蒋介石先生和中枢诸公采纳全国民意和西北军民的主张，重新确定对内对外的国策”^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正确的主张是在“七君子”尚在狱中，而又无法收到延安电台的广播的情况下，由救国会的几位干事提出的。他们明确地意识到：如果杀蒋，“内战势必扩大，国家民族的前途更加危急”。因而，他们力排内部的异议，坚持团结抗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②。而这一立场和中国共产党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完全吻合。由此可见，救国会坚持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立场是坚定的，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定环境下，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争取人民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是救国会坚定不移的方针

实现并坚持抗战和争取国内政治民主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政治任务。没有国内的政治进步和民众的奋起，抗战的发动和胜利是不可能的。救国会在其《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中提出：“我们迫切的需要一个各党各派的合作抗日会议；同时迫切地需要一个以普遍选举方式产生的国民救亡会议，很迅速地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救国政权。”^③这就是要用抗日民主联合政权来取代蒋介石的专制统治。但是，蒋介石政权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残暴地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又坚持一党专政的“训政”。因此，救国会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可以“七七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前期的锋芒所向，主要是反对南京政府摧残抗日民主力量，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要求开放和保护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后期主要是反对国民党包办抗战，压制民众和坚持一党专政的片面抗战路线，要求以“宪政”代替“训政”，主张发动民众和各党派平等的联合，进行全面和彻底的抗战。

从“九一八”至“七七”事变期间，国民党的“安内”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残酷镇压抗日民主运动，至使几度高涨起来的抗日潮流趋向低落。华北事变后，北平学生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的威吓之下，发动了悲壮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大示威。以后，救国运动发展到全国各地。^④这一抗日救国运动，同样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暴镇压，为此救国会议员人士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他们要求蒋介石政府马上做到：“一，严惩各地摧残救国运动的负责长官；二，取消对爱国运动的戒严令；三，撤废新闻检查制度，开放新闻封锁；四，释放被捕爱国学生及市民，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同样事件发生。”^⑤马相伯先生发表公开谈话，激烈地抨击南京政府是在“替日本人帮忙，压迫爱国运动”，实在是日本的“帮凶”^⑥。

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公布“五五宪草”，企图以宪法的形式加强其专制统治。救国会强烈反对，痛斥国民党当局“不但丝毫没有表示在训政期间久已届满之后放弃一党的专政，反而想进一步一面在立法上巩固一党专政的基础，一面加紧对异已势力

① 《国难新闻》第1期，1937年1月11日。

② 参见胡子婴：《关于救国会和“七君子”事件的一些回忆》，第459页。

③ 《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14日。

④ 《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⑤ 《大众生活》第1卷第9期，1236年1月11日。

⑥ 《救亡情报》第10期，1936年7月12日。

的压迫”，这完全是“偏狭的，意气用事的见解和带有权术意味的手段”。^①

一九三六年七月，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救国会诸领袖赴京请愿，严厉质问国民党当局：“政府尽管空言决心抗日，一面却以内战消耗国力，并拼命压迫人民爱国运动，如何叫人民相信政府是抗日的呢？”^②同时，马相伯又以极犀利的语言指出：“君有过则谏，反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终身委员长就是皇帝，委员长做了这许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了，难道委他的人民不应该有所表示么”^③

救国会争取抗战和民主的正义斗争和进步主张，必然引起南京政府的忌恨，“七君子事件”终于发生了。但是由于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发展，由于救国会诸领袖威武不屈的斗争，这场震撼全国的冤狱非但没有吓倒爱国民主力量，反而使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趋向更加高涨，并成为诱发“西安事变”的重要因素之一。^④南京当局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最终不得不有所收敛和让步。救国会争取民主和抗战的积极斗争，对于促成民族抗战的实现和抗战初期国内政治形势的相对好转，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七七事变”后，全国性抗战实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和国民党政府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抗战的问题”了，^⑤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而国民党执行的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其主要表现就是“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⑥这两条对立的路线的主要分歧就是要不要以民主的方式发动全国民众参加抗战。救国会和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主张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民众运动，而“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地拿铁和血和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唯一出路”。“脱离了民众，单是政府，抗日必然失败。”^⑦同时，救国会还认识到“抗日救国的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方面单独所能完成的”，必须实现“各党派各方面共同联合”，而“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各派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⑧救国会把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斗争看作是争取抗战的实现和胜利的重要内容。他们的斗争是坚决的，并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影响。

武汉广州失守之前，国民党当局的抗战还是比较积极的，但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表现出不可克服的矛盾状态，为了利用民力为其服务，国民党也表示“政府对民众之自由必须加以尊重”，但它又害怕人民力量壮大起来，危及其统治，因此强调对民主“同时亦必加以约束”^⑨对于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力量，则企图以“溶共”和“合并”的方式加以削弱。一些御用文人随之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张。这一压制民众排斥异己的方针，极大地阻碍了抗战的胜利进行。因此，救国会对此进行了不屈的，同时又是充分说理的斗争。“七七事变”后第三天，全救会紧急宣言指出：“人民是抗敌御侮最基本最伟大的力量”，“应该获得最彻底的自由，才能发挥其潜在的伟力”。同年十二月，以沈钧儒为主创办的《全民周刊》开宗明义地说明其“最最基本的任务是加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接受

①②③《救亡情报》第6期，第12期，第10期。

④ 参见胡子婴关于“七君子”事件和西安事变的回忆，周天度编《救国会》第463页。

⑤⑥《六大以来》上，第858页。

⑦《大众生活》第6期，《生活知识》第2卷第6期。

⑧《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抗战以来的血的教训，将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抗战转变为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而“最最主要的问题”则是“政治机构民主的问题，国防经济的问题，革命外交的问题，民运开放，武装人民的问题。”^①一九三八年，当御用文人起劲地鼓吹法西斯理论时，胡愈之在《国民公论》上发表文章指出：“用轰炸机、大炮、毒瓦斯、S·S（秘密侦探）、监狱、集中营来造成统一”，是“法西斯国家的统一”，“真正的统一一定是民主的统一”^②。这些主张同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的精神基本上是符合的。

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华政策有重大改变，对国民党采取了“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而惧怕人民力量日益壮大的国民党当局，则从比较积极的抗战转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内政治出现一股逆流，其特征就是反共反民主。然而，为了欺骗舆论，国民党政府又“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③，于一九三九年秋，在国民参政会上抛出“宪政”提案。救国会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抓住宪政宣传，反对反民主逆流。《国民公论》发表《抗战与宪政》的短评指出：日本侵华方针已“由军事中心主义，一变而为政治中心主义”，“一切和平反共口号的提出，证明敌人要以政治分化代替武力进攻”，因此国内的政治进步就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而政治上出现逆流的“基本的原因只有二个：一是“除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并没有完全确定合法的地位”；二是“大部分民众……缺少直接参预政治的机会”。真正的宪政“应该使全国军民都有代表参加制宪及民宪机关”，而不能“使宪法的起草与颁布徒然成为画饼充饥”^④。这些分析和主张击中了国民党假宪政的要害。

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分裂和妥协的方针，终于酿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内“政治上的逆流更有急转直下之势”。救国会认识到：“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从而使抗战坚持到底”^⑤。邹韬奋等九人发表《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揭露国民党当局对“拥护团结，坚持抗战，力争进步”的文化团体和爱国人士横加迫害的大量事实，提出“改革政治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其核心就是“坚持抗战国策”；“团结须更具诚意”；“民主政治立即实施”。他们从中国的抗战经历中认识到：“现在虽然很不幸地发生了局部的逆流，但我们坚信，靠着全国人民的巨大力量，也一定能旋乾转坤，而达到胜利与光荣的彼岸。”^⑥如果说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人民通过奋斗，克服了种种政治和军事上的危机后的结果，那么救国会为实现其政治主张而进行的斗争，无疑也是人民奋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充分肯定。毛泽东曾在致函救国会主要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时指出：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权与红军表示诚恳的致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⑦。“我们诚恳地愿意在全国联合救国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⑧这封信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对救国会政治主张的高度评价。

① 《全民周刊》第1期，1937年12月11日。

② 《国民公论》第一卷第1号，1938年7月11日。

③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宪政》。

④ 《国民公论》第2卷第7号，1939年10月1日。

⑤⑥ 《大众生活》第1号，1941年5月17日。

⑦⑧ 周天度编：《救国会》（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28页。